

程焕文 (中山大学 信息管理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 (上)

[关键词]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史; 中国; 晚清; 西方图书馆观念

[摘要]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前后和清末新政时期等四个历史阶段。本文通过对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历史考察,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图书馆观念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

[中图分类号] G259.2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14(2004)03-0087-04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 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面对着西方的坚船利炮,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和魏源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 以对付外国列强的侵略。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林则徐编了《四州志》, 魏源编《海国图志》, 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 书中的材料都是靠间接采访而来的, 难免有不少谬误, 但是这些著作毕竟让中国人开了眼界。“林、魏之后, 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 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 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 但既然去了, 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 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1]同样, 他们在出国的过程中也不会不接触到西方的图书馆和西方的图书馆观念, 这种接触也不会不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产生一定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中国国门的不断打开, 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他们出国的目的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 而不是图书馆学, 但是, 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作为西方近代文明标志之一的图书馆。当然, 他们中间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西方图书馆和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主要是一些留学生、学者和出使官员。虽然不是每一个接触过西方图书馆和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人都能够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完整或部分地带回来并且在中国予以传播, 但是能够有此作为的并不鲜见。他们或者以文字的方式记载和介绍西方的图书馆和西方的图书馆观念, 或者以实际的行动倡导和创办西式的图书馆, 多少都会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产生一定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有不少人在出国期间接触过西方图书馆和西方图书馆观念, 但是能够留下文字记述的并不多。同时, 他们所留下的文字记述通常也都是只鳞片爪,

没有完整的专门著述。所以, 笔者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勾画出中国人考察西方图书馆的一些不完整的线条。

1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与西方图书馆的接触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大门。面对着这突如其来且艰难勉强的国门开放, 人们并没有思想准备。因此, 尽管鸦片战争后“出洋”已成为可能,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尤其是知识阶层的人士, 在浩瀚的大海面前, 仍然是犹豫不决或踟蹰不前。后来, 由于一些相当偶然的因素, 一些士大夫终于迈出了国门, 去到了西方国家。正因为如此,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出洋”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的“出洋”具有明显的不同。由于最初的中国人“出洋”常常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所以, 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不是考察西方图书馆, 而是遭遇或接触西方图书馆。自然, 他们也就难以留下多少有关西方图书馆的记述。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人, 是鸦片战争后最早接触到西方图书馆的中国人之一。1841年, 容闳进入澳门玛礼逊学校读书。1847年1月4日, 由于其美国老师勃朗先生(Rev. S. R. Brown)回美国时“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 俾受完全之教育”的偶然机会, 容闳与黄胜、黄宽等人, 从黄埔港乘“亨特利思号”(Huntress)帆船, 开始了到美国的旅程。其后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 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 成为中国人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的第一人。^[2]作为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容闳对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年时, 容闳曾专门著述《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一书, 总结了其60多年的经历。在这本著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容闳接触美国图书馆的点滴痕迹。

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时, 耶鲁大学的兄弟会“有一小藏书楼”, 为了“博微资”以助学, 容闳曾“以会员之资格”参加过兄弟会藏书楼司书一职的竞选, 并如愿以偿“得与是选”。于是自1851年起(即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的第二学年末), 容闳开始“为兄弟会管理书籍”, 并因“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 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样前后三年级中之学生, 稔予者几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 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3]虽然兄弟会藏书数并非真正意义的西方近代图书馆, 但是它毕竟多少还是有几分图书馆的意味, 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讲, 容闳似乎可以算做是最早在美国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的中国人。

依常理推测, 容闳在美国的时间很长, 他应该接触过不少图书馆, 并且了解美国图书馆的观念。遗憾的是, 笔者尚未发现容闳在此方面的记述。同时, 容闳的著作

《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n》出版于1909年，其中译本《西学东渐记》直到1915年才出版，所以，笔者无法确认容闳对美国图书馆的接触是否对西方图书馆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过影响和作用。

在容闳留美的同一年，也就是1847年，福建厦门人林鍼（字景周，号留轩，1825—？）因偶然的机会“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亦曾出洋美国工作年余，1849年回国。由于林鍼乃是“经理通商事务”的翻译，所以，他出洋美国的目的与容闳完全不同。但是，由于林鍼在旅美归国不久曾专门写过《西海纪游草》，记述他在美国的见闻，所以，学术界认为：“指数1840年以来‘走向世界’报道，只能从林鍼的《西海纪游草》算起。”^[4]林鍼把他的记述谦虚地比喻为“测海窥蠡”，意即用小小的贝壳去测量大海，诚然如是。

虽然《西海纪游草》是“近代中国人测量大海的第一块贝壳”，^[5]但是其中并没有“测量”美国图书馆的记述，只有记述他见到西方印刷术和报纸的感想。林鍼在《西海纪游草自序》中言“美国‘铁铸书铸，技夺天工灵活。”并特别注释道：“集板印书，以及舟、车、春、织、锤、铸等工，均用火烟轮，运以机器，神速而不费力。余独有志于舟车之学，可以济公利私。惟独力不支，苟吾人有志共成，不期年可以奏效也。”而对于美国的报纸，他的感想是“大政细务，以及四海新文，日印于纸，传扬四方，故官民无私授之弊”。^[6]

《西海纪游草》大约完成于1849年，文字甚短，亦少见流传，但是从现在发现的版本来看，其中有闽浙江总督左（宗棠）、镇闽将军兼管海关印务英（桂）、福建巡抚徐（继畲）等人的题记，可见当时人们确实把林鍼的西海之游看作空前的壮举。^[7]

此外，在此时期尚有一些中国人出过洋并留有文字记述的，例如：广东人罗森曾于1854年自香港美国柏利（Perry）舰队到琉球及日本，并在香港《遐迩贯珍》月刊1854年第11、12号及1855年第1号上发表过其撰写的《日本日记》。但是，这些记述文字均没有涉及外国图书馆的内容。

总之，在国门初开的鸦片战争时期，出洋的中国人尚未对西方的图书馆和图书馆观念发生兴趣和表示关注。

2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

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发动了一场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洋务运动。虽然这场运动有不少消极面，但是，由于洋务派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与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往往是因为偶然机会出洋有所不同的是，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大多数人乃是受清政府的派遣——一种政府行为。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是清政府办理洋务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不发达，个人的物质条件、主动精神和活动范围受限制，中国士大夫出洋在多数情况下只能属于官方派遣的性质。这是晚清中国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一个主要特点。

在洋务运动期间，有机会考察外国图书馆的中国士大夫的出洋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官派出洋和个人出洋两类，其中，依照其出洋的目的不同，官派出洋又可以细分为：出洋游历、外交使团、出使大臣、商务出洋等不同类型；而个人出洋也有因偶然机会出洋和应外国邀请出洋的不同。因为出洋的基本目的是去了解西方文化，考察西方科学技术，并试图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他们对西方图书馆及其图书馆观念多少总会有所注意，有所感触。

2.1 奉派出洋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更多的人睁开了眼睛。统治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感到有必要修改对外政策，学会和外国打交道，开始主张了解外洋情况，培养外事人才。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开办了同文馆。这些都是洋务的重大举措。但是，仅仅是这些举措还无法改变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极度无知状态，所以，1866年2月20日，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等人上奏道：“查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迟迟未敢决请。”^[8]于是，清政府在1866年派遣了第一批人员出国游历。这样一批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是由斌椿父子率领的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而其组织者则为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

斌椿（1804—？），汉军正白旗人，经总税务司赫德延请办理文案。当总理衙门准备派人赴欧洲游历时，大小官员“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只有63岁的斌椿“慨然愿往”。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旗人，其次因为他接触过一些近代文化知识，对于远游并不害怕，而且还颇有兴趣。斌椿父子率同文馆学生三人，于同治五年（1866年）1月21日离开北京启程，途径越南、新加坡、锡兰、埃及等地，3月18日到达法国马赛，其后历经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家，于6月22日折返法国，7月10日离马赛回国。斌椿一行在欧洲游历的时间不到4个月。应该说，他们的收获并不是很多的。斌椿“随时记载，带回中国”的，只有薄薄一册《乘槎笔记》，其中在欧洲的见闻不到两万字。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毕竟是近代中国士大夫最早亲历欧洲的记述，因而它也就有着特别的意义。正如李善兰在《乘槎笔记序》中所言：“斌君凡身之所至，目之所见，排日记之。既恭录进呈，又刻以行世，令读其书者，亦若身至之而目见之也。然则斌君非独一人游，率天下之人而共游之也。”^[9]

比较遗憾的是，从斌椿的《乘槎笔记》来看，斌椿一行在4个月的出国游历中，除了1866年3月27日在巴黎时曾“赴印造书籍及电机寄信各公所”以外，^[10]并没有接触到欧洲的图书馆。不过在3月11日游览埃及时，斌椿曾经了解到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点历史。斌椿写道：埃及“初名厄日多，为西土建国之祖。东界阿刺伯、犹太。文教最盛，都城藏书七十万册，嗣为回部焚毁”。^[11]从这段注释文字来看，斌椿并没有感到外国图书馆与中国藏书楼的差别。

随斌椿、赫德（Robert Hart）游历欧洲的3名同文馆学生，即英文馆（班）的德明（张德彝）、凤仪和法文馆

(班)的彦惠,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当时年龄都不过十八九岁。在此次游历和此后一生中,凤仪和彦惠都似乎没有什么著述。只有张德彝特别爱写。他先后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了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见闻录,共70余卷,200余万字,算得上一个大游记作家。与斌椿相同的是,张德彝(1847—1918),汉军镶黄旗人,在专门记述这次游历欧洲的著述《航海述奇》中,除了提到曾参观过“英国伦敦印造新闻纸处”以外,^[12]也没有任何有关西方图书馆的文字记述。

2.2 外交使团

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在1868—1870年期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因为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外交使团出使西方国家,所以,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1868年8月18日(同治七年七月初一日),这个外交使团在从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开往波士顿的一列客车上悬挂龙旗,在西方国家第一次升起了中国的国旗。从此以后,龙这种传说中的神灵动物,就被全世界看成古老中国的象征。^[13]

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这第一个外交使团由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即: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此时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孙家毅。张德彝亦随行,但在欧洲游历了英法两国后,因故提前回国。志刚和孙家毅在“初使泰西”之后分别留下了《初使泰西记》和《使西书略》等文字记述,而张德彝则如同前次随同斌椿出洋游历一样留下了一部《再述奇》。

虽然这次初使泰西时间较长、出使的国家较多,但是由于是“初使泰西”,所以志刚一行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只可能是走马观花。从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来看,大概只有一处在记述纽约的大书院时曾经涉及到图书馆。

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初二,志刚一行到纽约,初七观大书院。志刚记述道:“初七日观书院。本地富人古博尔者,老而无子,乃竭产独力建造大书院。凡西国所应学者,区以别之,各有教师。又各有男女学习之所。藏书之室,熔铁为架,倚壁成城。择人专司,许观不许借。略同宁波天一阁之制。可谓善用其富者矣。”^[14]从志刚所言“大书院”“藏书之室”“略同宁波天一阁之制”来看,他和斌椿一样并没有感到外国图书馆与中国藏书楼的差别。

与几乎所有出国的洋务派人物一样的是,泰西的“奇器”和“技艺”也是志刚关注的重点,所以,志刚在此方面的记述往往比较详细。例如“志刚在记述同治七年(1868)六月十三日在纽约参观印书法时,志刚是这样写的:“观印书法。其法以铅鏊为洋字共若干,如聚珍版。以黏聚于径七八寸、长尺许之圆木轴为一页,横支于架。架下登转皮,则上轴转。轴下为几,铺纸其上。轴旁有墨毡轴。手扶纸以视斜正,足登机以转轴。轴经墨毡滚于纸面,而成一页。其印新闻纸机器,则尤为捷便。先以铅字,黏聚于瓦形之板,镶于总圆轴。轴愈大。则所镶之板愈多。所见者,一轴镶六板。每板旁有小墨毡轴。每一墨轴,承以墨池。上接绳屉以入纸,下承墨池以滚墨。大机一动,大轴转而六纸印成矣。闻每日所出万余纸,纸方

三、四尺。”^[15]在记述同治七年(1868)六月二十一日观呢雅嘎尔大瀑布上游小岛上的“水机造纸者”时对水轮机造纸法的描述亦甚为详尽。^[16]

随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对于泰西的观察显然与志刚有较大的差别。

如上所述,志刚在记述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初七参观纽约的图书馆时称其为“大书院”,且描述比较平淡。而张德彝在《再述奇》中的记述则是这样的:“初六日甲寅(注:时间与志刚的记述相左一天)晴。午初,乘车行里许至义社,系富室古柏尔建造,费数万元。高楼周十余里,广置天下书籍画本、石人泥像,令郡内居民学习,或读或画,或塑或刻,听其自便,一切支应皆伊供给。”^[17]张德彝把美国的公立大学称为“义社”,并通过“广置天下书籍画本、石人泥像,令郡内居民学习,或读或画,或塑或刻,听其自便,一切支应皆伊供给”这样的文字来说明其“义”(公共性和平民化)之所在。这当然比志刚称其为“大书院”更能使人明白:美国的大学并非是中国的那种“书院”,其图书馆亦非“略同宁波天一阁之制”的“藏书之室”,而是不同于中国“书院”的“义社”。

更为重要的是,张德彝还特别记述了当日在纽约参观公共图书馆的情形,而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并没有对此做任何记述。张德彝在记述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初六日参观完纽约“义社”后又特别记述了参观纽约“义书堂”的情形:“又行三里许,至义书堂,名‘阿司德儿’,亦系名人建造。周五里,白石层楼,内储各国古今书籍七万五千余卷,国人乐观者,任其流览,以广见闻,惟禁携带出门,与点窜涂抹而已。”^[18]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张德彝的这段文字可能是晚清官派出国人员对西方图书馆的最早记述。毫无疑问,虽然张德彝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西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意义和对中国近代化可能发生的潜在作用,但是,从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这种“国人乐观者,任其流览,以广见闻”的机构名称翻译为“义书堂”来看,张德彝已经明显地注意到了西方公共图书馆与中国藏书楼的差别,即所谓的“义”——公共性和平民化。

继这次随蒲安臣、志刚使团出访泰西之后,张德彝还曾多次随使泰西各国,并出使英国大臣,先后还著有:《三述奇》八卷、《四述奇》十六卷、《五述奇》十二卷、《六述奇》十二卷、《七述奇》(稿佚)、《八述奇》二十卷等记载其出国情形的著作,但多未刊行。而在已刊行的其它“述奇”中,尚有一些有关西方图书馆的记述,笔者将在下述有关部分论及。

2.3 海外漫游

王韬(1828—1897),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后因上书太平军逃亡,始改名韬,字子潜(紫诠),号仲弢,晚年自号天南逸叟,江苏长洲甫里人。1845年17岁时中秀才,1848年到上海省亲时接触到最早随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东来的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麦都思(Dr. W. H. Medhurst)。1849年麦都思正式邀请王韬到其于1843年创办的专门出版西书、宣传西学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参加编校工作。1862年,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13年后,因被清政府指为“通贼”(太平军)而逃亡香港。到香港后,王韬开

始襄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 (James Legge) 翻译五经四书。1867年,理雅各返回英国,招王韬同行。于是,王韬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漫游,并在欧洲生活了两年多。1870年,王韬随理雅各回到香港,并在佐理译事之余,编写了十四卷本《普法战记》。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仿西报之例,每日于首栏发表论说一篇,宣传变化图强主张,一时名声大振,并成为著名的政论家。其时,日本正锐意求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王韬的《普法战记》成了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大势的必读之书。日本人乃于1879年邀请王韬赴日本进行交流,于是,王韬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出国漫游。1884年,王韬移家至沪,任《申报》编纂主任,1887年,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1897年病逝于上海。

王韬先后撰写了《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两部著作,专门记述他两次出国漫游的情况。由于王韬与当时出洋的其他人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他对东西洋图书馆的考察也就具有不同的意义。正如叔权河所言:“从鸦片战争(1840)到光绪元年(1875)三十五年间,中国人亲历东西洋记载,为数很寥寥。林鍼和罗森,斌椿和志刚,分别代表出洋的两种类型:个人谋生和国家派遣,通俗地说,也可以叫为私为公。但那时的公家只是封建朝廷,公家人的思想往往更为正统,并不见得比‘布衣’高明。林、罗出身市井,斌、志隶属八旗,思想见解都无足称,其记载的价值大抵只在客观记录这一方面。说到这段时期出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容闳,只能数王韬了。”^[19]

在漫游欧洲之前,王韬在香港就已经对近代化的书院和博物院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说:香港“中环有‘保罗书院’,上、下交界有‘英华书院’,上环有‘大书院’,皆有子弟肄业,教以西国语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国家用。‘英华书院’兼有机器活字版印书籍。”^[20]又言:香港“最近为博物院,中藏西国书籍甚多,许人人内缘阅。舆地之外,如人体、机器,无不有图,纤毫毕具。院中鸟兽虫鱼、草木花卉,神采生新,制造之妙,殆未曾有。”^[21]所以,王韬在漫游欧洲时十分关注欧洲的图书馆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韬认为巴黎的图书馆乃是巴黎胜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他在记述“巴黎胜概”时专门写道:“至于藏书之所,博物之院,咸甲于他国。法国最重读书,收藏之富殆所未有。计凡藏书大库三十五所,名帙奇编不可胜数,皆泰西文字也。惟‘波素拿书库’则藏中国典籍三万册,经史子集略备,余友博士儒莲司其事。儒莲足迹虽未至中土,而在其国中钻研文义,翻译儒释各经,风行于世,人皆仰之为宗师。奉为圭臬。”^[22]对法国巴黎林立的图书馆和丰富的馆藏十分赞赏。

在参观英国伦敦“博物大院”(大英博物院)后,王韬对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伦敦“博物大院”“建于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其地袤广数百亩。构屋千楹,高敞巩固,铁作间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以防火患也。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图、古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其地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巔至趾,节节度书,锦帙牙签,鳞次栉比。各国皆按榻架分列,不紊分毫。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能操华言,曾旅天津五年。其前为广堂,排列几椅,可坐数百人。几上笔

墨俱备,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出。”^[23]

在英国伦敦期间,除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以外,王韬还参加考察过不少图书馆,这可以从他对英都伦敦的描述中窥见一斑:英都伦敦“都中藏书之库林立,咸许人人而览观。有典籍院,中贮四海各帮之书,卷帙浩繁,简编新洁,异册名篇,分诸于架阁。玉轴牙签,缙函锦帙,望之如城。中土经、史、子、集,罔不赅备。都中人士,无论贫富,人而披览诵读者,日有数百人。然只许在其中缘阅,不得携一卷一篇外出,其例甚严。”^[24]

可以说,在漫游欧洲期间,王韬每到一地,博物院、大书院、典籍院等文化学术机构和场所基本上都是他“漫游”的重点。例如:王韬对英国爱丁堡有这样的记述:“埃丁堡城中设有大书院,藏数百万册,士人皆可入观,惟不能携取外出。每岁读书子弟约一千四百余人,学成名立而去者不知凡几。”^[2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韬不仅参考察了许多图书馆,而且还在“游(苏格兰)亨得利乡”时应邀到“公共图书馆”做过专门的“学术报告”,并为图书馆撰写过专门的文字——《金亚尔乡藏书记》。这段史实见诸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游亨得利”:“距亨得利十数里许,有金亚尔乡,民秀而良,秋冬农事之暇,多喜读书讲理。近日众人各募资创建书院,皮藏典籍,有志之士均可入院借观。所藏分内、外二室。外室者准其携取外出,书名于册,按期缴纳。主院者折简招余往为说法,倾听者男女千余人。余别作《金亚尔乡藏书记》以贻主院者,院成当勒诸石,以垂不朽。”^[26]

由此可见,王韬虽然是“漫游”西方的图书馆,但是,他对西方图书馆考察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走成观花的官派出洋使臣所能比拟。可以说,在晚清的出洋人员中,王韬对西方图书馆考察最为详尽,称得上是中国真正考察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

在考察欧洲图书馆的过程中,王韬对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和特点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感受。对此,我们不难从王韬在记述欧洲各图书馆时不厌其烦地说明“都中藏书之库林立,咸许人人而览观”;“都中人士,无论贫富,人而披览诵读者,日有数百人”;“士人皆可入观,惟不能携取外出”;“有志之士均可入院借观”等等这些文字中看出其中的端倪。尽管如此,虽然王韬深谙西学,但是,王韬也没有找到比较确切的中文词语来翻译西文的“图书馆”(Library)一词,王韬先后使用过“藏书之所”、“藏书之库”、“书库”、“典籍院”、“大书院”、“书院”等词语来表达西文的“图书馆”一词。由此可见,虽然王韬比较熟悉西方的图书馆,但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藏书机构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通用名称,王韬面对着这些完全不同于中国情形的西方“图书馆”也是束手无策。这种情形在晚清出洋人员中十分普遍。

1879年,王韬应邀出游日本,其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期间,为了向西方学习,日本也不断地派遣人员“出洋”考察。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人在考察了西方图书馆以后,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于1872年(明治五年)创办了西式的“东京书籍馆”,其后,日本各地逐渐开始普遍设立“书籍馆”。于是,“书籍馆”一词开始

● 祁思妍, 刘新生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5)

北师大的学子 图书馆界的骄子

——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关键词] 王重民; 目录学家; 生平事迹; 学术思想

[摘要] 王重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 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文献学、敦煌学及文化史专家。一个逝世 28 年的学者其学术思想仍影响很大。本文记述了王重民孜孜不倦、勤奋治学的事迹。

[中图分类号] G251.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5-8214(2004)03-0091-02

2003 年是王重民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北京大学于该年 9 月举行海内外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会, 纪念这位北师大的学子, 图书馆界的骄子。王重民先生由于受“四人帮”迫害过早逝世, 他的名字并不为一些年青师生所熟知。但是如果你用“王重民”检索 1997 年—2002 年 6 年间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全文中可以命中 767 篇文章, 引文中可以命中 277 篇, 篇名可以命中 11 篇。一个已经逝世 28 年的学者, 其学术思想仍在延续, 可见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查阅与其有关的文献, 你会被王先生的孜孜不倦、勤奋治学的精神所震撼。

王重民(1903—1975), 字有三, 号冷庐, 河北省高

阳县人, 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文献学、敦煌学及文化史专家。1929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就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3 年 9 月—1934 年 6 月兼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历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代理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和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始人。一生研究国学, 著述宏富, 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著述有《老子考》、《图书与图书馆论丛》、《中国工具书使用法》、《敦煌古籍叙录》、《中国书史》、《中国善本书提要》等, 还编辑了《太平天国官书》、《徐光启集》、《敦煌变文集》等大量文献著作 160 余部(篇)。

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录记载, 王重民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第 17 届毕业生, 1924 年入学, 1929 年毕业。据一些文献中有关人士回忆, 王先生在我校求学时曾受到名师高步瀛、杨树达、袁同礼诸先生的赏识, 又与黎锦熙、钱玄同、吴承仕往来密切。“他治文史师事陈恒, 深受器重。于目录学尤为熟娴, 尝作文章, 冠同学前列, 为陈垣北方及门弟子‘河北三雄’之一”。从王重民校辑 1930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的《越缙堂读史札记》卷首王式通、杨树达、高步瀛三先生序中可见诸位先师对王重民的赏识。重民先生在我校求学时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维持上学的费用, 后经师长袁同礼介绍课余到北海图书馆工作。从此即踏上一生为之致力研究的目录学的里程。他风华正茂,

在日本流行起来。^[27]也就是说, 日本从开始引进西方图书馆观念起, 他们就对西文的“图书馆”一词有比较一致的用于区别日本过去的“文库”一词的通用译名——“书籍馆”。其后日本又将“书籍馆”统一改为“书馆”, 而“书馆”一词又被中国借用, 此是后话。

王韬应邀出游日本时正值日本古代“文库”向近代“书籍馆”转变的时期, “书籍馆”这种新生事物当然会引起王韬的关注。王韬在《扶桑游记》中专门记述过他“游书籍馆”的情形: 光绪五年(1879)五月七日, 王韬在东京与日本友人“同谒神田圣庙。日东对庙为明遗臣朱舜水斫匠所造, 一仿明代制度。继谱书籍馆观书, 馆寮归山海室、山田松斋特供茗果。”^[28]

为了说明“书籍馆”的特点, 王韬在这段日记下专门写了一段按语: “按: 旧幕盛时, 事孔圣礼极为隆盛。每岁春、秋二丁释菜, 三百藩侯皆有献供。所奏乐器, 金石咸备。维新以来, 专尚西学, 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

馆, 广蓄书史, 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 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开馆至今, 就读者日多, 迩来日至三百余人, 名迹得保不朽。惟开馆日浅, 所蓄中土书籍仅九万三百四十五册, 西洋书籍仅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册。此外尚有‘浅草文库’, 藏书颇多珍本。”又言: “圣庙本在上野, 今废为公园, 宽文十年乃移于此。宽政十年土木盛兴, 焕然一新。维新后仍行祭孔子礼, 明治五年乃立书籍馆。”^[29]在这段注释文字中, 王韬特别地说明了: 废“神田圣庙”而“开书籍馆”乃是“维新以来, 专尚西学”的结果, 以及“书籍馆”“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的特点。或者说, 王韬已经开始把“开书籍馆”提高到了“维新”和“专尚西学”的认识层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考察东西洋图书馆的一个进步。这也大概是王韬之所以要特地撰写这段按语的目的吧。(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 2003-06-12 (全文)

[责任编辑] 张欣毅